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

刘 琪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

摘 要： 基于2013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 *Logit* 和 *Mlogit* 模型分别检验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决策以及创业类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的子女平均人力资本能显著促进流动人口创业；使用各学历子女所占比例反映子女人力资本结构，证实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子女所占比例越大，流动人口创业的概率越大；子女人力资本在不同创业类型中的作用机制存在异质性，相对而言其更能促进雇主型创业。政策启示在于引导流动人口转变思想观念、深化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立法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权益、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

关键词： 子女人力资本；流动人口；创业；农村劳动力；家庭迁移

中图分类号： F24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 - 0202(2019)06 - 0096 - 15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创业问题再次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对于处在经济转轨期的中国，鼓励大众创业、提升创业水平对于实现就业与经济的双增长有着重要意义[1]。自 1984 年城乡流动限制放松后，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2]，但学界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关注却稍显不足。流动人口创业不但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带来一系列社会效益。一方面，其创业行为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并创造了更多工作岗位，能有效增加就业收入，保障基本民生。另一方面，关注流动人口的创业问题有助于他们在城市更好地落脚，提升其融入城市的能力[3]，为我国市民化进程的有序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现有对流动人口创业影响因素的探讨多围绕制度环境、心理特征以及社会网络等，鲜有人关注子女因素对创业的影响。王菁和张锐考察了子女数量的作用，证实了子女数量越多，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越大[4]。钟粤俊等则在其基础上引入男孩比重变量，进一步发现子女性别结构对创业行为的作用机制[5]。以上学者均从子女因素角度完善了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研究框架，但他们的研究仍存在一个共同不足，即忽视了子女人力资本的作用。子女人力资本会对流动人口创业产生何种影响？又是出于怎样的逻辑动因？这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会增加支出，降低当期收入，但却能在未来产生诸多收益。从成本方面来看，子女人力资本的提升会带来家庭教育成本、日常消费成本以及定居成本的提高，这很有可能激励父母为获取更高收入而选择创业。从收益方面来看，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通过家庭内部互动等行为，流动人口的眼界视野也会随之变得更加开阔，家庭的异质性社

收稿日期：2019 - 05 - 30 **DOI：**10.7671/j.issn.1672 - 0202.2019.06.0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633002)

作者简介：刘 琪(1991—)，女，河南郑州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家庭创业。E-mail：419680129@qq.com

会网络会进一步扩大,风险偏好也会有所提升,这些均为流动人口创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本文认为,不论从成本效应来看还是从收益效应来看,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都会对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造成一定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使用 2013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以上逻辑进行检验。

二、流动人口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与不足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实现家庭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这一初衷激励着他们去从事报酬更高的工作,扩大家庭财富。创业作为弱势群体改变自身不利经济地位的有效途径,对流动人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拥有比本地居民更高的创业倾向。Fairlie & Lofstrom 的研究发现,在许多发达国家中,流动人口创业的比率远高于本地人,且这一比率仍有上升趋势[6];Hunt 指出,相比于本土员工,技术型移民更有可能创立员工人数超过 10 人的企业[7];张双志和张龙鹏进一步发现,无论是“自己是老板”型创业还是“个体工商户”型创业,流动人口的创业概率均大于本地居民[1]。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驱动了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呢?

不少学者使用“推拉理论”来解释流动人口的创业动机,认为存在拉力与推力两种力量驱使流动人口创业[8]。首先,制度环境被认为是促使流动人口创业的重要推力因素。Waldinger 指出来自移居国的就业市场劣势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创业,原因在于:相对于本地居民,流动人口在求职方面不占优势[9]。一方面,制度壁垒的存在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有效转移,可能会使流动人口过去掌握的职业技能不被流入地劳动市场认可,由此导致其丧失良好的就业机会或不得不从事低端职业[10-11]。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流动人口往往面临着来自本地居民的歧视与排斥,这造成他们很难及时获取可靠的、高质量的就业信息[12-13]。因此,对于在劳动力市场面临劣势的流动人口而言,创业成为其增加财富并维持尊严的最佳选择[14]。

除了就业壁垒、文化约束等一系列不利于流动人口求职的制度推力因素外,还存在一些驱动流动人口创业的拉力因素。第一,与本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具备更多有利于构建创业机会的心理特征。一方面,“背井离乡”这一行为本身就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敢于“背井离乡”的群体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15],当高风险的创业机会来临时,他们往往能够率先作出行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大多具有相对较强的相对剥夺感,这成为驱使他们改变自身不利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动力。对财富的强烈渴望使得流动人口时刻关注并寻找着身边的机遇,因此其主动寻求创业机会的动机更强[2,16]。

第二,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组织内的多数成员都乐意互相分享资源[17],这种来自群体内部的特有资源能帮助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受益[18],从而成为促进其创业的拉力。例如:Bizri 的案例研究发现,在同族移民所带来的社会资源的帮助下,移民所创办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生存成功并得到扩张[19]。Mosbah et al. 在研究中指出,在移居国成功创业的移民多数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之一:获得早期同族移民创业者的支持;与本地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其配偶是本地人[20]。此外,当移民群体在空间上集聚到一定规模,其内部往往会诞生一些特殊的市场需求,例如对少数民族产品的渴望,或是希望由同族的人提供服务等[21],这些需求赋予了移民企业家独特的优势,也促进了其创业。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第一,目前对流动人口创业影响因素的讨论多围绕制度环境、心理特征以及社会网络等,而对流动人口的家庭因素关注不足。就我国的流动人口而言,多数人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经济资本积累能力较弱;由于所受正规教育与参与的技能培训较少,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往往较低;此外,由于背井离乡,流动人口失去了原有的社会网络,在流入地

也很难建立起新的有利社会关系,由此导致其社会资本也较为匮乏[22]。再加上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造成流动人口无法享有城市的保障制度与福利制度,增加了其流动性约束,同时也导致流动人口与市民在获取贷款机会时面临的机会不平等[23]。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三重缺位并受制于二元分割的创业环境的背景下,来自家庭内部的支持对流动人口的创业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连接的家庭成员的关系更加亲密、稳定与持久,基于这种关系得到的家庭资本相较于其他社会资本而言获取成本更低、可持续性更强,并具有排他性优势[24-25]。然而遗憾的是,目前较少有文献基于家庭内部资源的视角探讨流动人口的创业问题。即使有,多数学者也只关注到父代资本对子代创业行为的影响[26-27],而忽视了对子代资本如何影响父代创业决策这一问题的考察。第二,少量有关子女因素影响父母创业行为的研究只关注到了子女数量、子女性别结构等显性人口特征的影响[4-5],而没有将更加重要的子女人力资本因素纳入考虑。已有文献证实了子女人力资本会对家庭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关系着家庭未来的福利水平[28-29],但目前尚未有研究探寻子女人力资本与父母创业决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本文拟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建立二元 *Logit* 模型与多元 *Logit* 模型来检验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决策以及创业类型的影响,以期为激发流动人口的创业活力提供新思路。

三、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的作用机理

Schultz 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解是:为了形成生存性的储存,人们审慎地支出了某些花费和牺牲,这些花费和牺牲体现在人的身上,在未来能产生服务[30]。Becker 同样指出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会降低现期收益并提高支出,但在未来却能带来大幅度的收益[31]。Bardhan & Udry 认为,为教育和培训付费会使得人们不得不在一定时期内将消费降到低于不选择受教育和培训者的消费水平[32]。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投资是一项成本与收益特征明显的经济活动。因此,本文将从子女人力资本提升所带来的成本效应与收益效应两个方面分析其对父母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

(一)成本效应

1. 教育成本。Becker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大重要方面就是对教育的投资[31]。近年来随着教育成本不断上升,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也水涨船高[33]。父母为了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需要投入大量花费,诸如缴纳高昂择校费用、购买学区房、报名培训班等。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前期积累下来的财富会得到很大程度耗散。此外,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不仅包括对教育、培训等方面支出的现实成本,还包括机会成本。子女选择接受教育意味着必须放弃直接就业所获得的工资收入,以及把上学缴纳的费用用于其他投资手段而获得的收益。并且随着教育层次提高,家庭因接受教育所损失的收入会越来越大。甚至有研究认为,对子女的投资从长期来看未必会给父母带来福利效应,甚至从短期来看还会加重父母的贫困[34]。

2. 日常消费成本。人力资本与居民的消费行为密切相关,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提升往往会带来家庭消费的提升。人力资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方式主要有如下渠道:第一,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意味着预期收入水平相应提高,家庭消费的约束边界得到扩展,进而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35]。第二,人力资本水平的积累能够改变人们的认知模式与思想观念,进而改变家庭的消费偏好,使家庭的消费观念由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36-37]。例如张学敏和何酉宁发现,随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其初级消费如衣着、食品的比重会下降,而高级消费如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的比重则会上升[38]。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流动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部分改善,消费结构随之升级,家庭在学习、社交、娱乐与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会变得更多,进而形成家庭新一轮的经济压力,最终可能

成为促进流动人口创业的一种动力。

3. 定居成本。人力资本是影响迁移者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人力资本提升,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主观意愿明显增强[39]。对流动人口的子女来说,随着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其返乡几率会大大减小,有很大一部分人会选择留居城市。作为生存的刚性需求,购买住房是子女定居城市的基础性条件[40],同时也造成了其最重的经济负担,城市过高的房价使多数子女不得不向父母寻求经济支持。李天国和南国铉的研究发现,父母的经济实力与支持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子女的新婚住房条件[41]。流动人口为了子女在城市更好地生活,提升家庭社会地位与子女在婚嫁市场上的议价能力,选择创业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

(二)收益效应

1. 视野开拓。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效应,即通过组内的人际互动与相互学习可以促进知识的外溢与扩散[42]。子女人力资本的提升首先会带动其自身眼界、品性等方面的发展,使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变强[43],与市场活动也更加接近[44-45]。接着,知识会在家庭内部实现代际传递。在日常交流互动中子女通过向父母传递相关市场信息与知识,潜移默化中培育了父母的市场意识、财富意识与创新意识,提升了人们的眼界视野与思维格局,最终将对创业起到积极作用。

2. 异质性社会网络扩大。许多研究表明,在社会网络中,弱关系网络才是获取丰裕且不重叠资源的有利工具,同时也能使创业者更容易获得创业初期的利润[46-47]。这意味着,以亲戚、朋友、老乡等强关系为主要关系网络的流动人口在创业过程中较难获取商业关系网络中的合适资源。然而,随着子女受教育水平提高,他们所接触的社会层次得到相应提升,个人社会网络得到扩展[48],这能帮助流动人口打破同质交往的惯性,使其社会网络关系也得到向外延伸,从而有利于获取更多创业信息与资源,缓解个体面临的创业约束。

3. 风险偏好提升。研究发现,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能力,能使人掌握更多实用性技能,并提升其应对风险的信心[49]。因此,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往往与其风险偏好呈正相关关系[50-51]。Larson et al. 的研究发现对自身知识缺乏信心的人往往更倾向于采取风险规避行为[52];Cole et al. 的研究证实一个人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对资本市场的投资兴趣越高[53]。而风险偏好作为一种后天的认知差异,会通过家庭成员的内部互动实现代际传递,使得父母与子女的风险偏好具有高度相似性[54-55]。通过日常的沟通与交流,子女向父母普及现代经济知识与市场运作规律,进而改变父母对经济事物的看法以及对待风险的态度,使父母对创业这项高风险活动具有新的认识,提升其风险承担倾向与对不确定性的忍耐度,从而提升创业的可能性。

本文认为,子女人力资本的提升既有可能通过增加家庭的各项生活成本促使父母创业,也有可能通过带来一系列非物质收益为父母创业提供有利条件。不管是从成本效应还是收益效应来看,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都应与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有着密切联系。

四、样本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一)样本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13 年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市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①,调查对象为 15 - 59 周岁的流动人口,该数据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方法进行抽样,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本文主要关注子女人力资

① 选择 2013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原因:只有在该年数据中子女情况一栏包含"子女是否在学"这一题项,根据该问题可以筛选出所有子女已不在学的样本。若子女仍处于在学状态,则不能确定其最终受教育程度。

本是否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因此对样本做出如下筛选:第一,受访者均处于已婚有配偶的婚姻状态;第二,剔除子女数量为零的样本;第三,受访者的所有子女均大于等于16岁,且在接受调查时都已完成学业,处于不在学的状态;第四,受访者的流动原因是"务工经商"。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创业决策,即流动人口当前是否创业。将目前就业身份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流动人口定义为创业,赋值为1,其他为0。

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子女人力资本。由于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途径,本文拟使用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借鉴陈钊等的思想构建两个指标衡量子女的教育水平[56],一是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①,二是子女的教育结构②。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共四类:(1)子女其他特征。子女数量与子女性别结构已被证实会影响流动人口创业,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2)经济特征。家庭收支比可以反映一个家庭在流入地的财务状况。一般来说,当务工收入能较好地满足生存,流动人口可能会出现"小富即安"的心理,不愿意尝试新事物,从而放弃风险较大的创业活动[57]。但随着财务状况进一步变好,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变强,此时个体的创业意愿可能会再次高涨,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了收支比的平方项对此加以验证。住房是家庭资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家庭财富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许多研究表明拥有房产会提高创业的概率[58-59]。此外,经济特征中的社会保障状况同样是影响个体创业决策的重要因素[60],因此在模型中分别加入了在本地与在老家参与的社会保障数目③。(3)个体特征。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年龄、性别、民族等个体特征已被证实是影响个体创业的重要因素[61-62],在模型中对以上特征加以控制。(4)流动特征。从流动时间、流动范围以及流入城市四个方面对流动特征加以控制。流动时间越长,流动人口对当地环境的熟悉度越大,其自我雇佣的概率就越高[63]。当流动范围较远时,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形成越困难,所面临的创业壁垒越大,同时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了解当地消费习惯,因此创业成本也越高[64]。本文的具体变量定义:是否创业,自营劳动者和雇主为1,其他为0;子女平均人力资本,总子女受教育年限/总子女数量;子女人力资本结构,各学历子女数量/总子女数量;子女数量(个);儿子比重,儿子数量/总子女数量;收支比,本地月总收入/本地月总支出;是否已购房产,已购商品房或政策性保障房为1,其他为0;本地社会保障数,本地参加的所有社会保障数量;老家社会保障数,老家参加的所有社会保障数量;受教育水平、配偶受教育水平,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分别赋值为0、6、9、12、15、16、19;户口,农业户口为1,其他为0;性别,男为1,女为0;年龄,2013出生年份;民族,汉族为1,其他为0;流动时间(年);流动范围,市内跨县=1,省内跨市=2,跨省=3。

---

① 根据每个子女的最终学历,将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依次赋值为0、6、9、12、15、19,将所有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加总后除以子女个数。

② 在后文中,本文将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教育结构分别称为子女平均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

③ 老家的社会保障具体包括: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商业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城镇低保、农村低保、城镇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本地的社会保障具体包括:城镇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商业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创业	0.4508	0.4976	0	1
子女平均人力资本	10.6179	2.4088	0	19
小学及以下学历所占比例	0.0479	0.1973	0	1
初中学历所占比例	0.5024	0.4715	0	1
高中学历所占比例	0.3186	0.4383	0	1
大专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	0.1311	0.3179	0	1
子女数量	1.5429	0.6570	1	5
儿子比重	0.6682	0.3756	0	1
收支比	2.6184	1.7477	0.125	37.5
是否已购房产	0.0959	0.2945	0	1
本地社会保障数	0.4566	1.0849	0	7
老家社会保障数	1.1390	0.7866	0	9
受教育年限	8.0757	2.6772	0	19
配偶受教育年限	7.8678	2.6699	0	16
户口	0.8862	0.3176	0	1
性别	0.6004	0.4898	0	1
年龄	47.5478	4.7144	32	59
民族	0.9478	0.2224	0	1
流动时间	4.8976	4.7695	0	38
流动范围	2.3809	0.7812	1	3

注:根据 2013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样本中有大约 45% 的流动人口选择了创业。就子女人力资本而言,平均人力资本为 10.6,处于初中与高中之间;各家庭初中与高中学历的子女所占比也相对最多。子女其他因素中,样本平均有 1 至 2 个子女,儿子占子女总数比重的均值为 0.66。经济特征中,流动人口的收支状况总体较良好,收支比达到 2.62;已购房产的比例只有 1%;在老家参与的社会保障个数多于本地的个数,但总体都较少。个体特征中,流动人口与其配偶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8.1 年与 7.9 年,处在小学与初中之间;89% 的人属于农业户口;60% 的人为男性;样本考察对象平均年龄为 48 岁;95% 的人为汉族。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机理,本文构建如下 *Logit* 模型:

$$ln\left[\frac{p_i}{1-p_i}\right]=\beta_0+\beta_1\cdot childedu+\beta_2\cdot X+\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P_i 是创业的概率,$1-P_i$ 是不创业的概率。*childedu* 是子女人力资本变量,X 是其他控制变量,ε_i 是随机误差项。

五、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决策的实证分析

(一)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决策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 *Logit* 模型的回归结果,汇报系数为几率比。第 1 列汇报了子女平均人力资本对创业的影响,第 2 至 6 列汇报了子女人力资本结构对创业的影响。由第 1 列可知,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的子女平均人力资本能够在 1% 的显著水平上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具体而言,子女平均人力资本每提升一个单位,其父母创业的几率比会增加 4.3%。

表2 子女人力资本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平均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结构				
	几率比(1)	几率比(2)	几率比(3)	几率比(4)	几率比(5)	几率比(6)
子女平均人力资本	1.0434***					
	(4.72)					
小学及以下比例		0.8287*				
		(-1.66)				
初中比例			0.8320***			1.1132
			(-4.15)			(0.94)
高中比例				1.1248***		1.3415**
				(2.58)		(2.50)
大专及以上比例					1.2190***	1.4812***
					(3.18)	(3.09)
子女数量	1.1526***	1.1350***	1.1472***	1.1385***	1.1407***	1.1561***
	(4.26)	(3.82)	(4.12)	(3.91)	(3.96)	(4.34)
儿子比重	1.2149***	1.1935***	1.2095***	1.1958***	1.2067***	1.2169***
	(3.59)	(3.27)	(3.51)	(3.31)	(3.47)	(3.62)
收支比	0.7997***	0.8001***	0.8004***	0.8004***	0.8002***	0.7997***
	(-12.21)	(-12.10)	(-12.21)	(-12.15)	(-12.13)	(-12.25)
收支比平方	1.0041***	1.0040***	1.0040***	1.0040***	1.0041***	1.0041***
	(5.04)	(4.90)	(5.09)	(4.99)	(4.96)	(5.10)
是否已购房产	1.6905***	1.7272***	1.6999***	1.7232***	1.7055***	1.6871***
	(7.38)	(7.70)	(7.47)	(7.67)	(7.51)	(7.35)
本地社会保障数	0.4226***	0.4248***	0.4234***	0.4245***	0.4239***	0.4223***
	(-27.63)	(-27.50)	(-27.58)	(-27.50)	(-27.59)	(-27.63)
老家社会保障数	0.9937	0.9968	0.9977	0.9989	0.9947	0.9951
	(-0.24)	(-0.12)	(-0.09)	(-0.04)	(-0.21)	(-0.19)
受教育年限	1.0006	1.0058	1.0047	1.0063	1.0047	1.0004
	(0.06)	(0.61)	(0.49)	(0.67)	(0.49)	(0.04)
配偶教育年限	0.9961	1.0006	0.9991	1.0006	0.9997	0.9958
	(-0.42)	(0.06)	(-0.10)	(0.06)	(-0.03)	(-0.45)
户口	0.8938*	0.8588**	0.8843*	0.8579**	0.8891*	0.8950
	(-1.64)	(-2.24)	(-1.81)	(-2.26)	(-1.72)	(-1.62)
性别	1.2940***	1.2854***	1.2900***	1.2841***	1.2923***	1.2940***
	(5.77)	(5.63)	(5.70)	(5.60)	(5.74)	(5.77)
年龄	1.2001***	1.2297***	1.2112***	1.2314***	1.2078***	1.1981***
	(2.63)	(2.99)	(2.77)	(3.01)	(2.72)	(2.60)
年龄平方	0.9978***	0.9976***	0.9978***	0.9976***	0.9978***	0.9979***
	(-3.01)	(-3.34)	(-3.14)	(-3.35)	(-3.10)	(-2.98)
民族	1.2831**	1.3005***	1.3102***	1.3043***	1.3147***	1.2799**
	(2.55)	(2.68)	(2.76)	(2.72)	(2.80)	(2.51)
流动年数	1.0562***	1.0572***	1.0566***	1.0573***	1.0565***	1.0563***
	(14.94)	(15.23)	(15.06)	(15.24)	(15.01)	(14.95)
流动范围						
省内跨市	1.1209*	1.1261*	1.1255*	1.1286*	1.1218*	1.1210*
	(1.72)	(1.79)	(1.78)	(1.83)	(1.73)	(1.72)
跨省	1.1680**	1.1627**	1.1707**	1.1672**	1.1641**	1.1711**
	(2.41)	(2.34)	(2.45)	(2.40)	(2.36)	(2.45)
城市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0.0023***	0.0019***	0.0030***	0.0018***	0.0029***	0.0031***
	(-3.61)	(-3.72)	(-3.45)	(-3.78)	(-3.47)	(-3.42)
观测数	13821	13821	13821	13821	13821	13821
准 R^2	0.1938	0.1927	0.1935	0.1929	0.1931	0.1940

注:以上汇报的系数为几率比,* $p<0.10$,** $p<0.05$,*** $p<0.01$,括号内为z值;流动范围以市内跨县为参照组;表3.6相同。

接下来,再进一步考察家庭中的子女人力资本结构对流动人口创业决策的影响。第 2 至 6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小学及以下学历、初中学历的子女所占比与流动人口创业的关系显著负相关(几率比小于 1),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子女所占比与创业的关系显著正相关(几率比大于 1)。第 6 列将各学历子女所占比例一同纳入方程①,结论基本保持不变。高中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子女所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动人口创业的几率比分别增加 34.2% 和 48.1% 。这一结果意味着,子女的高中学历是一个"分水岭",是促进流动人口创业的起点。当一个家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子女到达一定比例后,流动人口的创业动机才会被触发。

再观察控制变量的影响。子女其他特征中,子女数量越多,儿子所占比例越大,流动人口创业倾向越强,这与王菁和张锐以及钟粤俊等的研究结果一致[4-5]。经济特征中,家庭收支比的系数为负,平方项系数为正,且都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家庭财务状况与创业呈"U"型关系,这与甘宇等[65]的研究结果相似,同时也验证了前文的猜想。起初随着家庭财务状况的改善,流动人口会摒弃风险较高的创业行为,去从事具有稳定工资的工作,然而随着家庭剩余不断增加,流动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这时其创业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已购房产对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房产可以反映一个家庭的资产状况,拥有房产的流动人口在创业过程中也能更轻易地获得抵押贷款,缓解融资约束。在本地参与的社会保障数目对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参与的社会保障数量越多,反映个体的风险偏好越弱,因此创业概率也较低。在人口特征中,非农户口、男性、汉族更倾向于创业。流动特征中,流动年份越久,创业概率越大;与前文推测相反的是,跨省流动人口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较大,可能与跨省流动群体具有较强的拼搏意识和较高的风险忍耐度有关。

(二)内生性讨论

然而,简单接受表 2 的估计结果显得不够严谨。因为子女人力资本是一个较明显的内生变量。第一,子女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父母的创业行为与创业精神可能会潜移默化中影响家庭氛围,开拓子女的视野,从而激励子女接受更高等的教育。第二,所得到的子女人力资本系数估计值并非子女人力资本与创业的"净效应",估计结果由于受混淆变量的影响会出现选择性误差。为了排除以上影响,本文的处理方法如下:

1. 样本的进一步处理。具体是将样本限定为最后一个子女进入其最高学历的年份早于其父母开始创业的年份,以此来保证父母的创业行为发生在子女跨入其最高学历后,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反向因果问题。

如表 3 所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子女人力资本对创业的影响效应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就子女平均人力资本而言,表 3 第 1 列显示,子女平均人力资本每提升一个单位,创业的几率比增加 2.8% ,这一结果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就子女人力资本结构而言,第 6 列显示,高中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子女所占比例越大,流动人口的创业倾向越强。高中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子女所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动人口创业的几率比分别增加 30.1% 和 29.4% ,二者分别在 5% 、10% 的水平上显著。

2. PSM 倾向值匹配法

根据倾向值匹配好的样本在混淆变量上取值近似,这样就能保证流动人口创业的差异只能归因于子女人力资本。本文的子女人力资本变量是一个有序分类变量,为了使用倾向值匹配法,需

①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将小学及以下学历子女比例略去。

要生成一个新的二元虚拟变量,此处使用"是否有子女上过高中"来表征家庭子女人力资本①。有子女上过高中的即为实验组,否则为控制组。

表3 处理样本后的回归结果

	平均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结构				
	几率比(1)	几率比(2)	几率比(3)	几率比(4)	几率比(5)	几率比(6)
子女平均人力资本	1.0278**					
	(2.51)					
小学及以下比例		0.8492				
		(-1.31)				
初中比例			0.8845**			1.1160
			(-2.37)			(0.87)
高中比例				1.1372**		1.3012**
				(2.38)		(2.02)
大专及以上比例					1.0825	1.2941*
					(0.99)	(1.7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0.0332*	0.0315*	0.0415	0.0310*	0.0342*	0.0374*
	(-1.74)	(-1.77)	(-1.62)	(-1.78)	(-1.72)	(-1.67)
观测数	9919	9919	9919	9919	9919	9919
准 R^2	0.1815	0.1811	0.1814	0.1814	0.1811	0.1817

经过平衡性检验②,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集中在5%以下,由此可以认为匹配效果良好,实验组与控制组中其他变量的差异在匹配后得到基本消除。

接下来根据倾向得分进行匹配,首先使用一对一近邻匹配法,再使用半径匹配与核匹配对结果加以检验。表4证实研究结果稳健性较好,结论不因匹配方法的不同而改变。以一对一近邻匹配为例进行说明,在匹配之前,实验组创业的概率要比控制组高出0.047,在1%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匹配之后,二者之间的差异为0.038,同样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子女人力资本对创业的影响作用变小,若忽视选择性偏差问题则会造成对子女人力资本效应的高估。

表4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匹配前后	实验组	控制组	ATT值	T值
一对一近邻匹配	匹配前	0.480	0.433	0.047	4.58***
	匹配后	0.480	0.443	0.038	2.66***
半径匹配	匹配前	0.480	0.433	0.047	4.58***
	匹配后	0.480	0.438	0.042	3.99***
核匹配	匹配前	0.480	0.433	0.047	4.58***
	匹配后	0.480	0.438	0.042	3.95***

注: * $p<0.10$, ** $p<0.05$, *** $p<0.01$。

① 由前文描述性统计可知子女人力资本均值为10.6,处于初中与高中之间。前文回归结果也显示,高中学历是促进创业的人力资本起点。因此以是否有子女上过高中为分界线对家庭子女人力资本进行划分。

② 限于篇幅,在此略去平衡性检验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六、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类型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创业群体内部存在很大差异,在上文回归中将自营劳动者与雇主的创业等同视之可能会对创业原因的理解产生偏差。一部分流动人口是由于自身就业能力低下,在劳动市场上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而被迫创业。这些人多从事街头贩卖、小作坊经营等,收入微薄,社会地位较低,这种创业类型的层次较低。还有一部分创业群体则享有较高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能够雇佣他人创立企业并按市场价格支付他人薪酬,这种类型的创业层次较高[66]。本文按照是否有雇佣他人这一标准将创业类型分为个体型创业与雇主型创业,考察子女人力资本对两种创业类型的影响机制是否有所不同。

(一)不同创业类型的样本均值 T 检验

表 5 对个体型创业与雇主型创业的样本变量进行了初步均值 T 检验。通过表 6 可以发现,个体型创业与雇主型创业不论在子女平均人力资本方面还是在子女人力资本结构方面均存在显著均值差异。因此,对两种创业类型的影响机理展开分别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表 5　个体型创业与雇主型创业的样本变量均值和 T 检验

	个体型创业	雇主型创业	T 检验
子女平均人力资本	10.60(2.35)	11.00(2.57)	-4.38***
小学及以下学历子女比例	0.05(0.20)	0.04(0.17)	1.46
初中学历子女比例	0.49(0.47)	0.43(0.46)	3.89***
高中学历子女比例	0.34(0.45)	0.37(0.45)	-2.14**
大学及以上学历子女比例	0.12(0.30)	0.16(0.35)	-3.70***
子女数量	1.57(0.67)	1.52(0.66)	1.84*
儿子比重	0.68(0.36)	0.68(0.38)	0.10
收支比	2.36(1.44)	2.40(1.62)	-0.71
是否已购房产	0.09(0.29)	0.12(0.33)	-2.76***
本地社会保障数	0.11(0.42)	0.20(0.65)	-5.26***
老家社会保障数	1.21(0.74)	1.21(0.83)	-0.15
受教育年限	8.10(2.53)	8.53(2.45)	-4.56***
配偶受教育年限	7.83(2.59)	8.26(2.45)	-4.50***
户口	0.90(0.30)	0.83(0.37)	5.91***
性别	0.64(0.48)	0.66(0.48)	-1.08
年龄	47.48(4.61)	47.58(4.59)	-0.58
民族	0.95(0.22)	0.96(0.19)	-2.10**
流动时间	4.89(4.30)	4.76(4.33)	0.77
流动范围	2.32(0.79)	2.34(0.78)	-0.97

注: * $p<0.10$, ** $p<0.05$, *** $p<0.01$,括号内为标准差。

(二)模型构建

接下来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来检验子女人力资本对个体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影响机制的异质性。样本中的个体面临着“不创业”、“个体型创业”、“雇主型创业”三种创业选择,本文将这三种无序选择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赋值为 1、2、3。由于无序选择可以在随机效用框架下来分析[67],因此构建每个个体 i 的效用函数:

$$U_{ij}=\beta_j' X_i+\varepsilon_{ij} \tag{2}$$

其中,X 为解释变量,ε_{ij}为误差项。接下来,使用 *Mlogit* 模型进行估计。个体 i 选择创业身份 j 的概率为:

$$prob(entrepre_choice) = p_{ij} = \frac{exp_{(}\beta_j' X_i)}{1 + \sum_{k=1}^{j} exp(\beta_j' X_i)} \quad (3)$$

其中,p_{ij}是个体 i 选择创业身份 j 的概率,$j=1,2,3$。X 表示影响流动人口创业身份的变量,包括子女人力资本、子女其他特征、经济特征、个体特征以及流动特征等。

(三)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不同创业类型的实证分析

表6是 *M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第1列与第2列主要考察子女平均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第3列与第4列主要考察子女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机制。各列的参照组均为非创业组。如前两列所示,就平均人力资本而言,相较于非创业,子女平均人力资本对个体型创业与雇主型创业的影响系数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具体来说,子女平均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动人口从事雇主型创业的几率比增加5.4%,从事个体型创业的几率比增加2.1%。就人力资本结构而言,相较于不创业组,高中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子女所占比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水平上促进雇主型创业。具体而言,高中学历的子女所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动人口从事雇主型创业的几率比增加59.8%;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子女所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该几率比增加67.4%。而在个体型创业组中,只有高中学历的子女所占比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相对而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更能够促进雇主型创业。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流动人口从事雇主型创业更多是受到子女人力资本提升所带来的收益效应影响。首先,雇主型创业需要创业者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与更敏锐的商业嗅觉,能够捕捉到新的机遇,因此需要个体具有更多的创业知识与更广阔的眼界;其次,雇主型创业对人力、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社会资源依赖较大,注重长期与外界维持良好关系,所以要求个体具有多样性的社会网络资本;再次,雇主型创业更加重视新的市场,创业风险较大,不确定性较高,因此要求个体具有较高的风险偏好。子女人力资本提升所带来的收益效应恰好满足了雇主型创业对个体的以上需求,因此其更能促进雇主型创业。而个体型创业对各种资源的需求相对较少,准入门槛低,因此受子女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没有前者大。

表6 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

	平均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结构	
	个体型创业(1)	雇主型创业(2)	个体型创业(3)	雇主型创业(4)
子女平均人力资本	1.0209*	1.0541***		
	(1.80)	(2.92)		
初中学历比例			1.1065	1.1965
			(0.77)	(0.76)
高中学历比例			1.2508*	1.5975*
			(1.64)	(1.94)
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			1.2159	1.6743**
			(1.28)	(1.9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0.0310*	0.0030*	0.0326*	0.0043
	(-1.68)	(-1.71)	(-1.65)	(-1.59)
观测数	9919	9919	9919	9919
准 R^2	0.1535	0.1535	0.1538	0.1538

在控制变量中,子女数量与儿子比重的影响系数均在个体型创业中更为显著,说明相对而言,二者更能促进个体型创业。个体型创业往往是个人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报酬缓解生存压力而做出的选择。因此,支出开销较大的多子女家庭和婚嫁压力较大的多儿子家庭更有可能从事个体型创业。此外,户口对两种创业类型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相对于非创业组,农业户口对于雇主型创业有着显著负向影响。这是因为,创业者的专业知识、财富水平、社会网络等都会对创业规模有显著影响[68-69],因此上述条件较为优越的非农流动人口从事雇主型创业往往更容易成功。

七、结论与启示

子女人力资本的提升会在无形中促使父母萌生创业的观念,使流动人口从就业转变为更高层次的创业,这对于流动家庭积累财富,融入城市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首次从子女人力资本视角切入,实证检验了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影响,结论如下:(1)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的子女平均人力资本越高,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越大,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2)使用各学历子女所占比例反映子女人力资本结构,更加明确了何种受教育程度是促进创业的起点。从人力资本结构来看,高中学历是一个"分水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子女比例越高,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越大。(3)子女人力资本在个体型创业与雇主型创业中的作用机制存在异质性。相对而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更有助于促进雇主型创业。

本文的启示在于:(1)引导流动人口树立和强化"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善人生"的观念,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鼓励其加大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流动人口的继续教育工作,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其劳动技能,同时也有利于流动人口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和提升家庭教育水平,从而做到科学育人,为子女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2)深化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的主体责任。科教兴国、教育强国已是我国国策,提供公共教育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目前地方政府却面临着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窘境。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教育的外部性正在逐步增强,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大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加大对流入地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使地方政府能够及时得到教育经费补偿,为解决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撑。(3)立法保障随迁子女接受基本义务教育的权益,逐步消除教育不公。目前,流动人口子女的高中教育仍处于制度的"灰色地带",大部分地区实行的仍是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属地管理制度,这使得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权益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19》显示,随迁子女的普通高中升学率仅为 34.23%,比当地考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机会平均低 23.02%,城市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就读普通高中仍面临着较大压力。建议分地区、分步骤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推广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制度,立法保障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使农村和城市孩子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缩小教育差距,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青少年人口的整体素质,同时也能促进家庭的向上流动。(4)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市民化进程,努力减少因制度因素造成的流动人口家庭分离现象,使其告别"候鸟式"的迁移模式。此外还要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弥补公共服务缺口,为农村劳动力的家庭迁移提供有利条件,这对于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提高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双志,张龙鹏. 中国流动人口的创业效应研究[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7(7):138-148.

[2]叶文平,李新春,朱沆. 地区差距、社会嵌入与异地创业——"过江龙"企业家现象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1):139-156.

[3]孙文中.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的创业型社会融入[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6):111 - 120.
[4]王菁,张锐. 家庭关爱的力量:子女数量对创业决定的影响[J]. 经济学动态, 2017(4):90 - 100.
[5]钟粤俊,林文炼. 家庭男孩比重影响了流动人口创业吗?[J]. 劳动经济研究, 2018(2):3 - 23.
[6]FAIRLIE R W, LOFSTROM M. Im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C]//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orth - Holland, 2015, 1: 877 - 911.
[7]HUNT J. Are immigrants the most skilled US computer and engineering workers?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5(1): 39 - 77.
[8]BATES T. Existing self - employment: an analysis of Asian immigrant - owned small businesse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99(3): 171 - 183.
[9]WALDINGER R. Black/immigrant competition re-assessed: New evidence from Los Angeles[J].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997(3): 365 - 386.
[10]PRICE M, CHACKO E. The Mixed Embeddedness of Ethnic Entrepreneurs in a New Immigrant Gateway[J]. Journal of Immigrant & Refugee Studies, 2009(3):328 - 346.
[11]SHINNAR R S, ZAMANTILI NAYI R D.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an Emerging Economy: The Case of Turkey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9(2): 559 - 575.
[12]REZAEI S, GOLI M. Norm Divergence,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Utilization of Self-Employed Immigrants' Qualifications[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09(3): 163 - 176.
[13]JONES T, RAM M, EDWARDS P, et al. Mixed embeddedness and new migrant enterprise in the UK[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4(5 - 6):500 - 520.
[14]LIGHT I. Disadvantaged Minorities in Self-Employment[J].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79(20):31 - 45.
[15]Levie J. Immigration, In-Migration,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nited Kingdom[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7(2 - 3):143 - 169.
[16]TANG J, KACMAR K M M, BUSENITZ L.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in the pursuit of new opportunit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2(1):77 - 94.
[17]LIGHT I. Immigrant and ethnic enterprise in North America[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84(2):195 - 216.
[18]FAIRLIE R W, KRASHINSKY H A. Liquidity constraints, household wealth, and entrepreneurship revisited[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2(2):279 - 306.
[19]BIZRI R M. Refugee-entrepreneurship: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7(9 - 10):847 - 868.
[20]MOSBAH A, DEBILI R, MERAZGA H.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Malaysia: What do we know so far? [J]. Kasetsar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8(2):351 - 357.
[21]陈昀, 贺远琼. 移民创业研究现状评介与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0(8):35 - 41.
[22]赵迎军. 从身份漂移到市民定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8.
[23]KUSHNIROVICH N, Heilbrunn S. Financial funding of immigrant business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2008(2):167 - 184.
[24]杨婵, 贺小刚, 李征宇.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12):170 - 188.
[25]HOFFMAN J, HOELSCHER M, Sorenson R. Achieving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family capital theory [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6(2):135 - 145.
[26]周敏慧, 陶然. 企业家精神代际传递与农村迁移人口的城市创业[J]. 经济研究, 2017 (11): 74 - 87.
[27]HABBERSHON T G. Commentary: A framework for managing the familiness and agency advantages in family firm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6(6):879 - 886.
[28]石智雷. 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 家庭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J]. 社会学研究, 2015(5):189 -

215.
[29]伍海霞. 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研究[J]. 人口研究, 2018(5):30 - 44.
[30]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Economic journal,1961(326):1 - 17.
[31]BECKER G 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5): 9 - 49.
[32]BARDHAN P, UDRY C. Development microeconomics[M]. OUP Oxford, 1999:123 - 125
[33]赵伟锋,杨云彦,石智雷. 成本收益失衡、学习演化与区域低生育水平强化[J]. 经济经纬, 2017(5):109 - 115.
[34]TANTURRI M L, SEGHIERI C. Economic Well-Being in Old Age in Italy: Does Having Children Make a Difference? [J]. Genus, 2008(1 - 2):75 - 99.
[35]刘子兰, 刘辉, 袁礼. 人力资本与家庭消费——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4):17 - 35.
[36]肖作平, 廖理, 张欣哲. 生命周期、人力资本与家庭房产投资消费的关系——来自全国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11):26 - 36.
[37]李翔, 朱玉春. 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3(12):112 - 114.
[38]张学敏, 何酉宁. 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J]. 教育与经济, 2006(1):5.
[39]叶俊焘,钱文荣. 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7): 40 - 52.
[40]杨菊华. 制度要素与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J]. 人口研究, 2018(1):60 - 75.
[41]李天国,南国铉. 父母资助对城市子女住房费用的影响——基于韩国家庭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人口学刊, 2017(5):103 - 112.
[42]JR R E LUK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9(1):3 - 42.
[43]Welch F. Education in Produc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0(1):35 - 59.
[44]FAFCHAMPS M, QUISUMBING A R. Social Roles, Human Capital, and the Intra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Evidence from Pakistan[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03, 55(1):36 - 80.
[45]HAUGEN M S, VIK J, MCELWEE G. Farmers as Entrepreneurs: The Case of Farm-Based Tour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 Small Business, 2017(3):321 - 336.
[46]DAVIDSSON P, HONIG B. The Role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among Nascent Entrepreneur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3):301 - 331.
[47]罗东霞,关培兰. 经济转型期中国女性创业者社会资本与融资战略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8(11):226 - 229.
[48]PAULSON A L,TOWNSEND R. Entrepreneurship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 Thailand[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4(2):229 - 262.
[49]AGARWAL S, MAZUMDER B.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3(1):193 - 207.
[50]李烜, 阳镇, 张雅倩. 为什么投资者的主客观风险偏好存在差异——来自 CHFS 的微观证据[J]. 南方经济, 2015(11):16 - 35.
[51]周弘. 风险态度, 消费者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J]. 经济科学, 2015(1): 79 - 88.
[52]LARSON L R L, EASTMAN J K, BOCK D E. A multi-method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risk: The impact on millennials' retirement investment decis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6(1):72 - 90.
[53]COLE S, PAULSON A, SHASTRY G K. Smart money?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financial outcome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4(7):2022 - 2051.
[54]CHARLES K K, HURST E. The correlation of wealth across generatio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6):1155 - 1182.
[55]赵颖. 中国劳动者的风险偏好与职业选择[J]. 经济学动态, 2017(1):62 - 76.

[56]陈钊,陆铭,金煜. 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于面板数据的估算[J]. 世界经济, 2004(12):25-31.
[57]张广胜, 柳延恒.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J]. 农业技术经济, 2014(6):4-13.
[58]BLACK J, MEZA D D, JEFFREYS D. House Prices, The Supply of Collateral and the Enterprise Economy[J]. Economic Journal, 1996(434):60-75.
[59]李江一,李涵. 住房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来自 CHFS 的证据[J]. 中国经济问题, 2016(2):53-67.
[60]周广肃,李力行. 养老保险是否促进了农村创业[J]. 世界经济, 2016(11):172-192.
[61]谢勇,周润希.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2):8+97-106.
[62]周广肃,谭华清,李力行. 外出务工经历有益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吗?[J]. 经济学(季刊), 2017(1):793-814.
[63]宁光杰. 自我雇佣还是成为工资获得者? ——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和收入差异[J]. 管理世界, 2012(7):54-66.
[64]魏下海, 陈思宇, 黎嘉辉. 方言技能与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6):36-46.
[65]甘宇,朱静,刘成玉. 家庭创业及其城乡差异:金融约束的影响[J]. 上海经济研究, 2015(9):15-23.
[66]景再方,陈娟娟,杨肖丽. 自雇还是受雇:农村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 CGSS 数据经验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6):87-97.
[67]MADDALA G S. Limited-Dependent and Qualitative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s[J].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387):80-81.
[68]COLOMBO M G, DELMASTRO M, GRILLI L.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the Start-Up Size of New Technology-Based Fir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4(8-9):1183-1211.
[69]EVANS D S, JOVANOVIC B. An Estimated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Choice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4):657-674.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on Entrepreneurship of Floating Population

LIU Q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3 and adopts the Logit Model and Multiple Logit Model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of children o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typ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quantitative findings are: The average human capital of children, measured by education years, can promote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with high school education or above can promote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comparatively speaking it will facilitate employer type entrepreneurship. The policy inspirations are: guid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change their ideas, deepening the reform on the educational and financial system, legislating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migrant children,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Key Words: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floating population; entrepreneurship; rural labor; family migration